



新世纪教育管理与学校发展丛书
范国睿◎主编

共生与和谐： 生态学视野下的学校发展

GONGSHENG YU HEXIE

SHENTAIXUE SHIYE XIAO DE
XUEXIAO FAZHAN

范国睿 等 著

新世纪教育管理与学校发展丛书

睿◎主编

共生与和谐：

生态学视野下的学校发展

范国睿 等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生与和谐：生态学视野下的学校发展 / 范国睿等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9

(新世纪教育管理与学校发展丛书 / 范国睿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5773 - 7

I. ①共… II. ①范… III. ①教育生态学—研究
IV. ①G40 - 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548 号

新世纪教育管理与学校发展丛书

共生与和谐：生态学视野下的学校发展

GONGSHENG YU HEXIE: SHENGTAIXUE SHIYE XIAO DE XUEXIAO FAZHA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腾飞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5 千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重大项目研究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教育生态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1
第一节 教育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1	
一、西方教育生态学研究新进展/1	
二、我国教育生态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2	
第二节 教育生态问题研究的逻辑展开/14	
第三节 教育生态学研究的方法论/16	
一、教育生态分析/17	
二、教育生态分类/18	
三、教育生态比较/19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20	
第二章 我国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历史变迁	21
第一节 古典学校教育生态系统/21	
一、古典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21	
二、古典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特征/28	
第二节 传统学校教育生态系统/30	
一、传统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形成/30	
二、传统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变/39	
第三节 现代学校教育生态系统/47	
一、现代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形成/47	
二、现代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变/49	
第三章 区域教育生态	51
第一节 区域性教育生态的特殊性/51	
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生态学研究/51	
二、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区域教育生态/52	

三、考察区域教育生态的方法论前提/55	
第二节 对我国当代区域教育生态的系统反思/56	
一、区域教育生态更新的历史经验/56	
二、区域教育生态更新面临的问题/63	
第三节 区域教育生态更新/65	
一、区域教育生态的价值取向更新/65	
二、区域教育生态更新的战略设计/73	
三、区域教育生态更新中的制度重建/76	
四、区域教育生态更新中的文化生成/80	
五、区域教育生态更新中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的当代使命/83	
第四章 学校变革的生态学分析	86
第一节 学校生态及其变革/86	
一、学校生态格局/86	
二、学校生态过程/88	
三、学校变革/96	
第二节 学校变革的生态动力/101	
一、学校病理与学校变革动因/102	
二、学校愿景与学校变革动力/104	
第三节 学校变革的生态过程/110	
一、学校变革的个体生态过程/110	
二、学校变革的群体生态过程/122	
三、学校变革的组织生态过程/125	
第五章 学校制度生态	132
第一节 从制度生态到学校制度生态/132	
一、制度生态/132	
二、学校制度的内涵、特征与体系/134	
三、学校制度生态/138	
四、学校制度生态与学校变革发展/145	
第二节 学校制度生态的基本结构/147	
一、学校制度生态的外部生境/147	

二、学校制度生态类型/150	
三、学校制度生态特征/153	
第三节 学校制度生态的缺失与障碍/155	
一、学校制度生态的缺失与障碍/155	
二、学校制度生态缺失与障碍的归因分析/158	
第四节 学校制度生态的价值转型/160	
一、现存学校制度生态的价值取向/160	
二、学校制度生态的价值转型/164	
第六章 学校组织生态	171
第一节 学校组织生态的冲突与论争/171	
一、冲突与论争/171	
二、权责与定位/173	
第二节 学校组织的生态位/174	
一、教研组：教学研究缺位的专业组织/175	
二、年级组：要管理效率还是教学效率/177	
三、备课组：教师的竞争舞台还是合作平台/181	
四、年级组+备课组≠教研组/186	
第三节 走向互助、合作与联合的学校组织/191	
一、年级组与教研组的互助与合作/191	
二、走向“跨年级联合教研”/194	
第七章 学校文化生态	199
第一节 学校文化生态的结构与内容/199	
一、学校文化生态/199	
二、学校文化生态的结构与内容/206	
第二节 学校文化生态的动态生成/213	
一、合理定位，自主确立发展思路/214	
二、观念引领，持续更新学校文化理念/216	
三、对内开放，主动创造共生资源/219	
四、自主调节，合理选择发展机制/221	
第三节 多元文化价值导引健康教育生态/223	

一、基于一元化价值选择的社会文化与教育病理	/223
二、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227
三、多元文化价值导引与健康教育生态的生成	/229
四、走向健康的教育生态	/233
第八章 课堂生态 235
第一节 课堂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235
一、课堂生态	/235
二、课堂生态系统活力	/236
三、课堂生态系统组织结构	/244
四、课堂生态系统恢复力	/248
五、课堂生态系统整体形态	/248
第二节 课堂生态运行机制	/252
一、课堂生态系统的活力机制	/252
二、课堂生态系统结构机制	/257
三、课堂生态系统恢复机制	/259
第三节 构建健康课堂生态	/262
一、健康课堂生态	/262
二、构建健康课堂生态的基本原则	/267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86

第一章 教育生态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由“oikos”和“logos”两个词根组成，最早由博物学家索罗（H. D. Thoreau）于1858年提出。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①。“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正式使用可能始于美国教育学者沃勒（W. Waller）提出的“课堂生态学”（ecology of classroom）的概念^②。目前，生态学成为研究和探讨教育问题的独特视角，教育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

第一节 教育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

西方教育生态学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尚属起步阶段。

一、西方教育生态学研究新进展

自沃勒在其名著《教学社会学》提出“课堂生态学”（ecology of classroom）后，到20世纪60年代，阿什比（E. Ashby）比较英国、印度和非洲大学后，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③。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前院长克雷明（L. A. Cremin）的《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并辟单章论述^④。几乎同时，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J. Eggleston）出版了以教育资

^① HAWLEY A H.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M].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0.

^② WALLER W. 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 [M].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32: 161.

^③ ASHBY E. Universities: British Indian, African: a stud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M].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④ CREMIN L A. Public educa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源分布为主旨的《学校生态学》^①。1979年，布朗弗布伦纳（U. Bronfenbrenner）在两篇论文基础上出版专著《人类发展生态学》（*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成为很多后继研究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假设。西方近来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教育的不同层面展开。以生态学的眼光来看，教育的不同层面可以被视为不同的“等级”（hierarchy），“使生态学能够对部分和全体做整体研究（holistic study）的基本概念是等级，是一种把事物放在有级别空间的安排方式”^②。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但是运行机制却不相同。因此不同等级研究成果之间不能直接相互推绎^③。

（一）区域教育生态研究

20世纪中叶，由于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美国的教育发展面临各方面的批评，对“进步教育”的批判不绝于耳。克雷明认为，不能把所有的教育失败责任都归咎于学校，必须看到学校以外的各种教育现象。为了拓宽人们的视野，他重新定义了教育的概念，“把教育看做一个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得出或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④通过这样的“概念泛化”，他为考察学校与家庭、教堂、图书馆、博物馆、夏令营、慈善机构、农村集市、住宅区、工厂、广播电台和电视网络等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为了说明这些机构之间以及个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教育结构”的概念。“一旦意识到教育机构的多样性，我们可能很快觉察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组成教育结构的教育机构之间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教育机构之间相互影响，同时又与维持它们并反过来受它们影响的大的社会之间相互影响；教育结构也与它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之间相互影响。”^⑤

事实上，克雷明的教育生态学研究集中在区域教育生态“等级”。后继区域教育生态学研究主要以学区为单位，侧重研究学区教育生态内部不同组

^① EGGLESTON J. *The ecology of the school* [M]. London: Methuen & Co., 1977.

^② YONG ZHAO, FRANK K A. Factors affecting technology use in schools: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3, 40 (4): 811.

^③ 邬建国. 生态学范式变迁综论 [J]. *生态学报*, 1996, (5).

^④ 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1607—1783）[M]. 周玉军, 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

^⑤ CREMIN L A. *Public educa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30.

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学区生态系统对于外部变革项目的影响作用。可以将这两个主题概括为区域教育生态关系研究和变革研究。

1. 区域教育生态关系研究

恩格尔哈德 (Jr. George Engelhard) 试图发展并检验一个用于考察密歇根州部分组织和环境变量与学区效能之间结构性关系的理论框架^①。这个理论框架源自组织理论, 以学生辍学率为学区效能指标, 代表组织效能研究的社会—生态路径。研究数据收集于 1972—1973 年的 487 个学区。数据的路径分析表明, 作为环境变量的学区规模, 是组织效能的主要决定性因子。在每天入学人数多的学区里面的学校, 他们的辍学率也比较高。马丁 (A. J. Martin) 以布朗弗布伦纳的生态理论为框架, 试图确定影响学生流动的潜在社会系统^②。特别是, 确定由家长提供学生转学的理由, 探索转学家长获取住房、职业和与学校互动方面的经验, 在社区水平识别区分转学儿童和非转学儿童区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确定与高学生流动率相联系的微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变量。访谈和调查的结果显示, 迁居 (residential moves) 是转学的首要原因。除此之外, 流动组家长与非流动组家长之间的差异是迁居的数量以及找到住房和工作的难易程度。流动学生家长倾向于居住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下和以租房为主的单元。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邻里微系统、家长—学校中系统和邻里、城市外系统的变量与迁居和学校流动性相关。辛普金斯 (S. D. Simpkins) 等人研究了儿童性别、儿童家庭社会生态、儿童校外活动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③。他们通过调查分析了不同的家庭生态系统 (主要来自密歇根州市、农村和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和来自密尔沃基的低收入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家庭)、不同的校外活动类型 (例如体育、艺术、消遣和社区中心活动、俱乐部、宗教活动)、不同的学生性别与不同类型的学生发展结果 (学术成绩、学术信念和问题行为) 之间的复

^① ENGELHARD G Jr. School district organization and student dropout [EB/OL]. http://eric.ed.gov/ERICWebPortal/custom/portlets/recordDetails/detailmini.jsp?_nfpb=true&_ERICExtSearch_SearchValue_0=ED189725&ERICExtSearch_SearchType_0=no&accno=ED189725, 1980-04-00.

^② MARTIN A J. An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systems and student mobility: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practices [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4). Vol. 64 (10 - A).

^③ SIMPKINS S D, RIPKE M., HUSTON A C., ECCLES J S. Predicting participation and outcomes in out-of-school activiti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social ecologies [J].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05 (105).

杂关系。结果显示，儿童对校外活动的参与以及与之相连的发展结果随儿童特征和社会生态的差异而变化。博克瑟（P. Boxer）等人研究了区域生态环境和学生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①。他们以教师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来源，使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评估了两个区域（城市和郊区）教师对支持或缓和学生攻击行为的个体认知因素（即他们对攻击行为和支持攻击的认识）和学校生态因素（aspects of the school ecology，例如同伴和教师对学生攻击行为的反应，学校处理学生攻击行为的程序）的认知。为了提高教师对学生攻击行为和信念的感知的效果，作者还使用了来自学生和学校记录方面的数据。调查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城市学校学生的攻击行为高于农村。这种区域差异同样出现在同伴对于攻击行为的反应中，“城市教师观察到，更多学生对于攻击行为采取了支持性的反应（例如，发笑、起哄，孤立升级）。”

2. 区域教育生态变革研究

弗雷（B. R. Flay）等人介绍在两个学区实施的“积极行动计划”（Positive Action Program）的效果^②。积极行动计划是涵盖个性发展（character development）、问题行为预防和学术成绩提高的整合性综合性学校改革模型（an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school model）。这个计划建立在自我概念理论、学习理论、行为理论和学校生态理论基础上，干预范围包括学校课程、学校“气候”、家庭和社区成员。计划实施后，两个区域学生学术成绩分别提高了16%和52%，违纪行为分别减少了78%和85%。恩洛（Walter Enloe）描述并评价了三个明尼苏达州农村学区、高等教育机构、明尼苏达州教育部门和国家教育组织共同调动资源实施“国际教育发展计划”的合作关系^③。他的研究报告聚焦于明尼苏达州红木秋天学区（the Redwood Falls School District）。在这里，国际教育发展计划演变成为学校和社区的发展过程。托马斯（K. G. F. Thomas）和贾茨（M. Gatz）描述了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对于心理健

^① BOXER P, MUSHER-EIZENMAN D, DUBOW E F, DANNER S, HERETICK D M L. Assessing teachers' perceptions for school-based aggression prevention programs: Applying a cognitive-ecological framework [J].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6, 43 (3).

^② FLAY B R, ALLRED C G, RDWAY N. Effects of the positive action program on achievement and discipline: two matched-control comparisons [J]. *Prevention Science*. 2001, 2 (2).

^③ ENLOE W. Education 2000: rural Minnesota in the world. a case study of Redwood Falls school district 1988—1991 [R]. Volume 1: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and Initial Products of Change. 1992. (ED349137)

康咨询模型实施过程及其中的咨询者—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影响^①。他们所谓的“心理健康咨询模型”（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model）不是针对学生的，而是“帮助当事人（即教师）更有效对顾客（即学生）开展与心理健康相关的计划，以提高整个社区的心理健康水平”。作者选取的两个区域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两个区域尽管表面上差不多，但是它们的社区和学校系统在重要方面都不一样。作者详细描述了在两个区域实施心理健康咨询模型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例如，在进入阶段，A地区的“草根”教师和咨询者自愿贡献自己的经验与咨询者一起实施计划，外部咨询者甚至没有与大多数校长碰面；B地区就没能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外部咨询者联系的首要人物是校长，而且是校长制定了教师参与和计划进入的大多数决策。外部计划的实施和评价阶段也是如此。经过比较，作者最终认为，“两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包括种族、民族、文化、资源以及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互动规范影响了咨询者和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促成了计划实施成功程度的差异。”

（二）学校教育生态研究

1983年，汉密尔顿（S. F. Hamilton）回顾了过去十多年的学校和课堂生态学研究成果，提出了学校生态学研究的4个标准^②。他指出，学校是社会组织。教师和学生在学校中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学术科目学习。与正规课程的学术知识和技能相对应的是学校和课堂社会系统教授的“潜在课程”的价值与行为。基于学校只是或主要是学术学习环境的教育研究和实践，在价值观方面相当有限，因为研究方法和教学技巧都将教学主要视为技术性任务。这是过去15年学校和课堂生态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学校在将来想要改进必须要听取的启示。他认为，学校生态学研究要努力实现的标准有4条。第一，将教学视为连续的互动过程而不是一套分散的输入和结果。学校生态学研究试图理解师生行为的复杂性，而不是将其视为片断，比如教师的提问风格或管理技巧以及学生对此的反应。第二，生态学研究将行动者（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及其他人员）的态度和感知视为学校和课

^① THOMAS K G F, GATZ M. A tale of two school districts: lessons to be learned about the impact of relationship building and ecology on consultation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1997, 8 (3).

^② HAMILTON S F.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ide of schooling [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3, 40 (5).

堂中的重要资料，这与行为主义坚持的只有可见行为才值得研究的观点不同。第三，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将其作为生态学研究的必要条件。第四，理想的生态学研究不仅考察即时环境（学校和课堂）下的人与环境互动，还考察其他情境，特别是家庭、社区、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对于这些互动的影响。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大多数学校生态学研究也确实遵循了汉密尔顿提出的标准。这个时期的学校生态学研究同课堂研究一样，注重研究学校生态系统内部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因为研究者的兴趣点不同，关注的“关系”也不同。部分研究者对于学校教育内部具体问题（特别是学生问题行为，例如偏见、攻击和暴力）感兴趣，关注的是不同的生态因子与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者对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关系感兴趣，关注的是学校生态系统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还有部分研究者对于学校面临的整体问题和整体变革感兴趣，关注的是学校变革过程中不同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

1. 学校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

麦科恩（C. McKown）以生态学理论为框架，评价了美国学校教育内社会认知训练（social cognitive training）、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和解放心理学（liberation psychology）三种减少偏见的理论，讨论了三种理论在偏见形成和减少偏见的干预措施方面所针对的生态结构和生态过程，指出了三者之间的互补关系。丹德烈亚（Michael D'Andrea）描述了暴力的定义与类型，论述了在学校中实施防止暴力计划的重要性，介绍了一个综合性的校本暴力防治计划^①。这个计划是基于发展—生态路径提出来的，主要适用于教育实践咨询者，包括直接学生服务、直接学校服务、间接学生服务和间接学校服务四个组成部分。作者将这个计划应用于夏威夷的4所小学。评价的数据表明，夏威夷校本暴力防治培训计划是在学校情境内实施暴力防治的有效计划。马利（J. Malley）等人描述了建立无暴力学校生态的框架^②。作者指出，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巨变要求教育机构扮演新的角色。工业时代的

^① D'ANDREA M. Comprehensive school-based violence prevention training: a developmental-ecological training model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2004, 82 (3).

^② MALLEY J, BECK M, ADORNO D. Building an ecology for non-violence in school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ality Therapy, 2001, 21 (1).

学校系统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聚焦于有用公民的生成，现在后现代生态系统必须聚焦于提升共同体的意义和对它的归属感以形成健康和有生产力的公民。作者列表比较了工业时期和生态时期的教育范式（见表 1.1），认为大型科层制学校的非人格化特征，强调服从、控制和秩序以及专注于等级、竞争和个人成功创造了一个让很多儿童感到异化、孤立和被拒绝的环境。为了消除学校暴力，我们必须改变社会环境。

表 1.1 工业时期和生态时期的教育范式比较

工业时期范式	生态时期范式
科层制	共同体
控制	关系
独立	相互依赖
竞争	合作
孤立、异化	归属
学生是工具	学生是目的
规模大、非人格化	规模小、人格化
以教师讲授为主	服务学习、团队学习

2. 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生态关系研究

史密斯（E. P. Smith）等调查了学校、家庭和社区内部一些生态因子与家长参与之间的关系^①。他们指出，研究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对于促进三者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以前的研究尽管已经开始说明影响三者关系的不同层次的因素。但是对于这些因素的研究基本上是单独实施的。因此，需要整合分析多重环境，以使我们看到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区因素结合在一起并且形成相互关联的影响。作者基于生态模型调查了美国东南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学区。调查结果的路径分析显示，家长背景和态度、教师的实践、学校及其周围的“气候”是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生态环境。这些因素与家长参与之间存在方向和程度都不同的影响关系。布兰德（S. Brand）等人调查了课堂生态环境与家庭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儿童在两种生态环境

^① SMITH E P, CONNELL C M, WRIGHT G, SIZER M, NORMAN J M, HURLEY A, WALKER S N. An ecological model of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1997, 8 (4).

里面的适应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差异与儿童的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①。他们使用课堂环境量表 (classroom environment scale, CES)、家庭环境量表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 调查了儿童感受到的课堂环境和家庭环境之间的一致关系；使用愤怒—郁闷—学习困难量表 (angry-moody-learning difficulties scale, AML) 和家长用愤怒—郁闷—学习困难量表 (parent AML, PAML) 调查教师和家长，确定儿童在这两种环境内适应行为的一致性；使用儿童外显焦虑量表修正版 (the revised children's manifest anxiety scale, RC-MAS) 和自我评估调查 (the self-appraisal inventory, SAI) 调查儿童的心理压力。调查结果表明，课堂与家庭环境之间在凝聚力和成就取向的重视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与教师、家长汇报的儿童在两种情境内的适应行为差异相关。一般而言，两种环境之间的不一致与儿童心理压力之间没有关系。

3. 学校变革的生态学研究

艾斯纳 (E. W. Eisner) 通过学校实地生态学研究，提出了高中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学校教育的整体生态性质以及这种性质与学校变革之间的关系^②。他指出，高中学校教育的问题是：(1) 学校工作日的结构性破碎；(2) 教师孤立；(3) 强调外部奖赏；(4) 日常学习和学校学习之间的分裂；(5) 教师对供职学校的主人翁意识淡薄。作者认为，高中教育的这些问题具有生态性质，是不能通过提高教育标准、延长教育时间和增加课程能够解决的。他指出，学校教育主要有 5 个主要维度：目的、结构、课程、教育和评估。5 个维度结合起来，“我们的学校变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超稳定系统，面对外部压力也不作出显著变革甚至毫不担忧。一些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处理外部压力十分拿手，它们将这些压力称为钟摆。正如每个人所知，钟摆不断摆动，但是哪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③ “如果要使我们的学校发生深刻变革，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学校生态系统要求我们关注这 5 个维度。它们共同塑造并指导着我们的学校。”^④

^① BRAND S, FELNER R D. Perceived ecological congruence across family/school environments: impact on the consistency of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adaptation among children and youth [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6, 24 (2).

^{②③④} EISNER E W. The ecology of school improvement [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8, 45 (5).

古德拉德 (J. I. Goodlad) 意识到“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难以进入课堂。他认为，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推进教育变革^①。作者指出，存在两种相当不同而且彼此冲突的教育变革实施方式。其一是线性模型，其二是生态模型。两种模型的认识论基础不同，即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基础。线性模型是一种输入—输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输出项基本是固定的，是以标准化测试表现出来的学生学业成绩。而输入项则随着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差异而不同。比如行为目标、教师胜任力以及标准化评价等。线性模型在一些需求可以明确界定以及达成目标所需技能清晰的系统中，能够良性运转。但是，在目标不清晰，以及由人参与带来多种变量的系统中，就很难产生实际效果。他指出，仅仅强调输入项的改变很难改变教育系统。生态模型认为，学校是一个以课堂生态系统为主体成分的生态系统，学校教育活动和学校生态因子之间会发生各种类型的互动。两种不同的模型视域下，会得出不同的教育改革策略。线性模型对应的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的发起者经常忽略改革执行者所处的特定学校生态环境，因此经常“进不了教室”。生态模型对应的是由学校共同体的使命引领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被古德拉德称为“更新”，是学校内部成员基于学校发展的自身需求主动要求变革外部生态环境。

佩特里迪斯 (L. A. Petrides) 等人评析了商业领域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和知识生态学，基于生态框架，审视这些理论对于学校发展的意义。作者认为，从一个实用的和政策的角度看，知识管理可以用于支撑教育管理，在此基础上支持教学。在当前教育系统利用数据和信息带来的影响是，知识管理能使学校从工业时期的科层制度进化到教育知识生态体，从而能在知识驱动的全球互联社会中生存。知识管理借助生态学框架才能使学校收集到各种数据，并把这些数据转换为有意义的信息，进而考虑怎样将信息转换为知识，从而服务于经深思熟虑的教育决策^②。

(三) 课堂生态研究

西方课堂教学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课堂教学

^① GOODLAD J I. Educational renewal and the arts [J]. Education Policy Review, 2000, 101 (4).

^② PETRIDES L A, GUINEY S Z.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school leaders: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inking schools [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2, 104 (8).